

那个年代中的

我们

上册

主 编：者永平
副主编：关圣力
章德宁
谢 晋

远方出版社

还原历史 抢救历史 痛省历史 珍藏历史

主 编
副主编

者永平
关圣力
章德宁
谢 晋

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胡絮青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 者永平 主编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9 ISBN 7-80595-483-6

I. 那…

II. 者…

III.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料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 D19900号

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者永平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新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2 字数: 720千 插图: 62

1998年9月第一版 199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595-483-6/1·20 定价: 48.8元 (A卷上、下)











序 言

激动与沉思(代序)

王 蒙

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名字激动了七十年代末一年的中国。她像闪电一样,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黑的更黑,白的更白。她用强光照射着你的灵魂,坚强的和高尚的灵魂将勇于袒露在光照和透视之下;而渺小的、怯懦的、善于伪装和变化的、狡诈的灵魂,将为自己的现形和掖藏无术而恼羞成怒、暴跳如雷。

她在死后,也仍然是一柄寒光闪闪的剑。

她是我们的党培育出来的,是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培育出来的,党终于胜利了,我们的民族没有灭亡,我们的人民更加聪明也更加坚定了。她是党的光荣,民族和人民的光荣。

但她是被人用党的名义残酷屠杀了的。我们的民族和



人民没有能拯救自己的女儿。她的惨死是党的耻辱，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耻辱，是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的伟大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九亿中国人民的耻辱。

许多时候了，人们在谈她、哭她、夸她、演她、唱她、画她、纪念她、学习她。如果她有知，将在九泉含笑。

可以含笑，但不能瞑目，不能安息。因为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她有权利问我们，她问了：“同志们和亲人们，你们谈我夸我哭我演我唱我画我纪念我学习我，但你们为什么没有救我？为什么没有救我呀！在我被割断喉管、被枪毙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让我们仰视着烈士的眼睛，正视着她那纯洁而又深情的目光，作出自己的回答吧。

并不是所有的人，或者是足够多的人都能无愧地作出回答。

如果能有足够多的人回答得响亮，那么，张志新同志也许本来可以不被屠杀。

一个伟大的党。李大钊、方志敏、刘胡兰、董存瑞、江姐……多少民族的精英、阶级的先锋、忧国忧民的志士、正气贯长虹的铁人组成了这个党。在铡刀、绞架、刑具、碉堡，在死



神面前,这个党英勇无畏,这个党的党员英勇无畏……然而竟有几个小丑在这个党的内外横行达十年之久,他们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以超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凶狠和残暴,摧残着党的最忠诚的儿女。

让这些小丑世代接受我们的人民的诅咒和憎恨吧。但是,为什么这么几个愚蠢、无知、空虚、歇斯底里、不会种田、不会做工……的小丑曾经一度吓倒了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强者。历史上的革命先烈和今天的张志新是强者。可我们为什么许多人在不学无术、信口雌黄的几个小丑面前变成了弱者?如果张志新这样的强者能够更多一些,能够在全国人民当中占上十分之一或者在全体党员当中占上三分之一,如果几千万人民和几百万党员挺身而出,像张志新一样坚定、勇敢、无私无畏,如果他们齐声说:“不!”就会有成亿的人跟上来说:“不!”就本来可以扼住握着割断张志新同志的喉管的屠刀的手。

是的,一年以后,几十万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说出了“不”!又几个月以后,“四人帮”被一网打尽,这说明了党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声势浩大(当然是虚与委蛇)的“批邓”和“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游行。



啊，中国，我强大而又软弱的、可爱而又可怜的母亲！
中国的女儿，党的女儿张志新啊，我们对不起你！

所以，我们激动，我们更要沉思。我们愤怒，我们声讨“四人帮”刽子手，我们也要想一想自身的责任，想一想“四人帮”是怎样得逞于一时，怎样一度蛊惑、奴役了我们。

历史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不能仅仅用个别恶人的个人品质来解释，不是天降灾星，正像历史的丰功，民族的节日，不能仅仅归功于个别伟人，不是天降救世主。

“四人帮”是那样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人民恨不得“生啖其肉”，然而，我们一度却只能或忍气吞声，或混吃闷睡，或牢骚腹诽，甚或饮恨自尽。我们太缺少张志新这样的强者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曾经迷信。迷信旗号、权威、革命的口号和辞句，却不尊重事实，不倾听实践的声音。我们有时候在事实面前，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面前闭上眼睛，被那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高腔所吓唬。“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主义真”是不怕砍头的前提，“主义真”的人才是强者。主义不真，主义被搅乱了的人，必然会失去勇气，只能变成懦夫。

我们又曾经轻信，把我们的不可剥夺和不可让渡的民



主权利，甚至把我们的头脑，把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能力，拱手交给了声言是代表我们的人，把我们的命运，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领导人个人的道德和善心。

我们的心灵上积蓄着过多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尘垢，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因袭的重担还在压着我们的身心。崇拜权势、人身依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大智若愚、难得糊涂，委曲求全、苟安求活，自我麻醉、阿 Q 精神，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乌烟瘴气，五花八门。

我们……直说了吧，和张志新比，我们太爱惜自己的喉咙和心脏了，我们自私！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杀害了张志新，而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要跟着喊口号：“坚决镇压……”镇压谁？镇压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的女儿和女儿的母亲，镇压我们阶级的精英和民族的灵魂，镇压我们自己的良心！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奋起如张志新，都能坦白、坚强、大胆如张志新，那就不会是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和被枪杀，而是那些屠杀党、屠杀人民的人化为齑粉！

但我们的民族毕竟像高山一样地屹立着。岳飞、邓世昌、张志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烈正是支持中华民族的钢筋。内忧外患砥砺了我们。我们的民族将以张志新为榜样



而复兴,我们的人民将因张志新的悲剧而觉醒,而奋起,返老还童,永葆青春。

我们将挺起胸膛:大声疾呼地纪念张志新,学习张志新,只要我们不忘记自省和自问。我们激动,我们沉思,我们更要为了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和女儿的生存和未来切切实实地做一些有益于“四化”的事情。许多年来,我们激动得足够多了,我们经常被运动起来,惊愕、兴奋、激昂慷慨,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却用自己的手打了自己人,或者用自己的血汗和财富、时间和生命去从事无效的或者事倍功半的工作。我们再不能干这种大轰大嗡的“豪举”了。特别是在今天,在大有希望、大有前途、开始了新的时期却又有许多麻烦的今天,就更要冷静,更要慎重从事,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我们需要激情,我们尤其需要科学。没有激情就没有革命,没有科学也没有革命。我们的悲愤太多了,因而更需要克制和耐心。需要切实有效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再不允许张志新的悲剧重演,你和我,我和他,我们必须把这一责任担当起来。为了这,我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献出我们的喉咙、声音、胸膛、心。

附言:

此文是发表在 1979 年第 10 期《北京文艺》上



的,后来收入个人散文集时,被漏掉了。此次考虑为《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写点什么时,想起它来,姑以之代序。

三十多年过去了,终于有这样几个年轻人,把我们民族和人民经历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用普通老百姓回忆的方式记录下来,用这些真实故事串起的历史,来告诉未来,告诉后人: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应当受这种摧残和磨难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

这是一种诚挚善良的心,这是一种直面人生、直面历史的道德勇气,是一种爱护中华民族的行为。

1998年6月1日



序 言

大家都来写文革(代序)

季羨林

“文革”结束后,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吸取教训了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法子算了。不算也罢。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样一



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创痕远远没有抚平。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还有一大批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宽宏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一件小而含意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

记得是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委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一种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



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我常想，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人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是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可是后来，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到1966年的“文革”是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文革”中，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